



羊城晚报记者 李妹妍

“昨夜我望见一个中国的城市……每一座神龛里有一个神像,可是差不多全被挂在庙龛上的花帷幔和旗帜所掩住了……”1840年,丹麦作家安徒生在系列童话《没有画的画册》中,以中国为背景叙述了“第二十七夜”的故事:一座中国城市、一所庙宇和一个思恋富家姑娘的年轻和尚,红尘之思,跃然纸上。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发现,安徒生从未到过中国,也不识中文,但这就童话里隐约可见广州海幢寺及十三行的身姿。

童话的想象里为何能分解出海幢寺的印记?久居大洋彼岸的作家和遥远东方的古刹,是经由何种方式产生了奇妙的联系?翻看广州两千多年的海外交往史,个中答案已不言而喻:珠江口往来商舶隐隐勾勒出一条文化交流的“海上书籍之路”,千百年斗转星移后依然传递着中华文明亘古常新的智慧。

西话寺影

“第二十七夜”故事里的佛寺,究竟是有原型还是作家虚构想象的?对此,安徒生在《没有画的画册》前记中早有声明:“我在这儿所作的一些画都没有经过选择,它们是依照我所听到的样子绘下来的。”

那何以见得叙述的就是广州海幢寺呢?蔡鸿生教授在《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一书中考证认为,“第二十七夜”创作于1840年,中西关系仍处于广州一口通商的状态,在西洋商人心目中的“对华贸易”其实就是“广州贸易”,因此,“第二十七夜”里的“中国城市”,“不可能是宁波或厦门,更不可能是北京,它只能是广州”。

这样说来,“一座庙宇”也就容易落实了。按照当时清廷规章,外国人在广州只能住在十三行的商馆里,仅在每月的初三和十八这两天允许前往海幢寺、陈家花园游玩,且每次出游人数不得超过10人——童话中的庙宇,毫无疑问就是海幢寺。

蔡鸿生的考证显然并不满足于逻辑推理。在安徒生笔下,年轻和尚的名字用丹麦文拼写为 Soui-houng, 英译本拼写为 Soui-hong,“倘要准确还原这个名字,应于广州话中求之”。

他指出,在清代广州口岸的十三行区,瑞典东印度公司商馆正门的横匾上,明确标出 Sui Hong 字号,一望而知是广州话拼音的“瑞行”。丹麦、瑞典在北欧一带带水,在广州商馆区也是并排而立的老邻居,两馆人员联袂出行海幢寺并非不可能,以至于在文学创作中给和尚安个“瑞行”的名字,在蔡鸿生看来,“非如此不足以显示‘中国城’广州的南国风貌”。



吴国霖收藏的部分马冈木刻雕版印书 李妹妍摄

制图/杜卉

E-mail:wbsp@ycwb.com



今日论衡之拍案说法

冤案制造者 要为“最高精神赔偿”埋单

□戴先任

据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消息,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7日作出决定,向刘忠林支付国家赔偿金合计460万元,包括无罪羁押9217天人身自由赔偿金2624448.58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1975551.42元。(1月7日中新网)

刘忠林获得197万多元精神损害赔偿,刷新了最高数额纪录,是“史上最高精神赔偿”。刘忠林获得巨额精神损害赔偿,是对他的应有补偿。在公开报道中,刘忠林是羁押时间最长、申诉时间最长的蒙冤者,他在出狱后仍没有平反,而且他出狱后双手十指指甲坏死、变形,右脚趾因坏死截肢,他还患上了严重抑郁症。无罪羁押9217天,没有杀人却背负杀人罪名达20多年之久,这对他精神伤害可想而知有多大,不仅是他本人,他的亲属也长期生活在“杀人犯亲属”的阴影之中,可以说再多的赔偿也无法真正弥补对冤案当事人及其家属造成的伤害。

但国家赔偿却是对冤案进行平反必不可少的重要一部分,如刘案中,巨额精神损害赔偿金更体现了对受害者精神损害的重视,对蒙冤者所受到的严重精神伤害来说,这也是一种必要补偿。

2015年,辽宁涉黑团伙伏案认罪案件二审宣判,被告人之一高超终审被法院认定无罪,而高超得到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只有1万元,仅为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的5.6%。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从无到有,近些年来呈上升趋势,近几年来,更是屡屡刷新纪录,这

体现的是司法进步,体现出的是对公民权益、人格权益的重视与保护。而重视对公民人格权益的保护,对于避免冤案的再发生,也有积极作用。让公安机关、司法部门“以人为本”,尊重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能更好避免践踏公民合法权益的冤假错案出现。

回到刘忠林冤案中来,刘忠林获得了国家赔偿,但对制造刘忠林冤案的相关责任人也要进行进一步追查,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必要的责任。依据《国家赔偿法》,“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对刘忠林支付国家赔偿金后,也应尽快启动向该办案人员实施追责及国家赔偿费用追偿工作。巨额的国家赔偿,不能只由纳税人埋单,制造冤案的责任人,更应为此担责。

刘案得以昭雪,让人看到正义虽然迟到但并没有缺席;“史上最高精神赔偿”,也体现了司法进步,体现了对蒙冤者人格权益的日益重视,具有标杆意义。更希望类似冤案不会一再重演,这就更需要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体制,堵住司法漏洞,让司法能够更好发挥“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惩恶扬善功能。

海上书籍之路 助推中学西传



吴国霖 《清代木刻雕版之乡马冈》 丝网 105cm×52cm

吴国霖创作的版画《清代木刻雕版之乡——马冈》,描绘马冈雕版印书场景 受访者提供

让学者们更感兴趣的是,在中西文明交流中,海幢寺充当了怎样的角色?

201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谢辉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有了新的发现:这里收藏有清代广州海幢寺经刻二十八部,最初由德国学者诺依曼带回欧洲。

现有资料显示,诺依曼在1830年10月搭乘东印度公司商船抵达广州,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总共购买了约六千册中文书籍,其中有“从道观和寺院流通处直接买到了道家 and 佛家的文献,还特别从欧洲洋行对面河南岛上的佛教寺庙中购得一些文献”。对此,谢辉解释称,“欧洲洋行即十三行,河南岛即今天的海珠区,

海幢寺正坐落于此”。

事实上,这并不是研究者们第一次在海外发现海幢寺经坊刻书的踪影。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政府特许游玩之地,海幢寺曾吸引了众多外国人前往参观,并留下详实的文字、绘画和摄影记录。美国人威廉·亨特在1885年出版的《旧中国杂记》中就有这样的描述:“……如果用英语来讲,这座庙的名字是‘海的帐幔’,它拥有一个内容充实的图书馆和一个印刷作坊。在那里,教义被刻在木板上,木板不断地印出书来,用来赠阅或出售。”

如今保存在大洋彼岸图书馆里相当数量的海幢寺经刻表明,这些书籍有相当一部分被来华西方人买走。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特藏部副研究馆员张淑

琼2012年对全球21所图书馆馆藏情况的查考,英国伦敦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等地共收藏有海幢寺经坊刻本及藏版书126种,其中,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马礼逊藏书就保存有八十多种海幢寺刊本或藏版的书籍。

“在德国人诺依曼之前,购买海幢寺经刻较为丰富的西方学者,当属英国人马礼逊。”张淑琼告诉记者,来华的外国人关注海幢寺及其经坊,撇除少有游玩之地的因素外,无疑还有更好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的意图,“比如佛教为何会在中国社会占有重要地位,马礼逊在收购中文书籍时会尽可能地收集释道著述。为了丰富英国的中文文献,他还向教会申请经费,最终在1824年将收藏的大量中文图书带回英国”。

马冈工艺

佛山顺德作家协会主席吴国霖计划在今年5月前完成《顺德马冈村史》的整理。“现在很少人还能知道,这里的刻字雕版曾经盛极一时。在国内以及流传海外的清代刻本中,不少书籍都是在顺德马冈刊刻。”吴国霖为此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据他判断,马冈的木雕版最早在清乾隆年间兴起,因广州书坊数量日渐鼎盛且缺少木刻工匠,便长期外发委托马冈刻字雕版。金武祥《粟香随笔》一书中亦有记载:“书版之多,以江西、广东两省为最。江西刻工在金溪县之许湾,广东刻工在顺德县之马冈。”

到了清朝中后期,佛山、广州等地都大量使用马冈的木刻板来印刷。在马冈冯源业先生记忆中,当时广州的商船到江门、香山都途经马冈,交通十分方便,马冈在南坊专门修建书前码头,即如今马冈粮仓的位置,刻好的书版在此经水路运往国内外。

对顺德马冈的历史挖掘让学界感到惊喜,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海上书籍之路”产销网络的货源渠道。李庆新认为,顺德得风气之先与水陆交通之便,刻书业与省城形成“一条龙”的产销关系,并通过省城图书网络延伸至国内乃至海外市场。

在印刷行业十分发达的今天,木刻书版早已被淘汰,吴国霖四处征集才收藏到仅10本马冈木刻雕版印书,“这些书的内容囊括千字文、书经读本、通俗读物等,其中还有图文并茂的广告画等,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研究价值”。

羊城晚报

时评

2019年1月8日/星期二/ 评论深度部主编/ 责编 张齐/ 美编 陈日升/ 校对 何绮云

“权健帝国”崩塌能否催醒暴富造梦者

首席评论

□阎昆

“权健事件”又有新进展。截至昨日,天津警方已对权健集团实际控制人束某某等18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而包括山东、广东等省的权健分公司也已停业整顿。

从一位患癌女童的命途多舛爆舆论,到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权健,对其涉嫌传销与虚假宣传犯罪进行调查,再到公安部门刑拘权健老板及一众高管,号称“百亿帝国”的权健转眼间从神坛跌落凡尘。

而媒体与舆论的围猎,则将“权健帝国”的民都见到了一个类似露天咖啡座的开放吸烟区,面积足有70余平方米。北京市控烟协会组织专家对此进行实地调查,回应称,该吸烟区明显违背《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并涉嫌误导青少年,应该取缔。记者发现,此吸烟区是一公司为宣传“共享吸烟室”理念而设立。(1月7日《新京报》)

闹市大街,70余平方米的高档吸烟区,这与其说是实用化的室外吸烟室,不若理解为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空间装置艺术。设计精致的不锈钢柱式烟灰缸,如咖啡

吧台一般的高级座椅,烟客们在其间无比惬意地吞云吐雾,此情此景简直就是现场直播的“烟草广告”,其给未成年人所带来的消极示范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以改善吸烟体验、鼓吹吸烟者权利为卖点的商业模式,天然就与全社会控烟的主流价值背道而驰。

的确,为了控制室内二手烟,各地都是鼓励单位建立室外吸烟区的。可即便如此,北京王府井这一设在人口密集区和行人必经通道的“开放吸烟区”,还是太夸张、太离谱、太恶心了。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造成了二手烟的不可控扩散,所有途经的路人,

身变为“清华高材生”、中医世家、手握600秘方“的伟大的束总”。

在权健这个神秘“帝国”里,到底有多少是真实可信的,委实令人生疑。公司吹嘘的“专利产品”,根本未通过专利部门的审核;满墙的奖状牌匾,若追根刨底,绝大多数来路不明;一个售价千元的鞋垫,据称对罗国腿、心脏病、前列腺炎都有奇效;明备备案的是保健品,却标榜为能治包括癌症在内的“百病神药”……

而权健之所以能迅速实现版图扩张,靠的也是传销式的“大忽悠”,集会培训、拉会员、发展下线,不断给新人“造梦”、“打鸡血”,描绘一夜暴富的迷人幻影。在充满诱惑的造富梦里,权健迅速开枝散叶,神奇地发展出全国“7000家火疗馆”。而在此背后,则是众多自上当继而去骗更多消费者的“加盟商”,以及无数的受害者。

但是,恐怕连权健缔造者自己也没想到,金碧辉煌的“权健帝国”大厦,却顷刻坍塌,而导火索竟是一个不幸女童的命运!这到底是偶然还是冥冥中的天意?

从受人追捧到千夫所指,权健的教训可谓触目惊心。它不只是对深陷舆论漩涡的权健及其追随者而言,对我们整个社会,都可说是振聋发聩的警钟。

传销说白了就是打着营商幌子的骗术,是受我国法律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之前因类似情形受到查处惩治的屡见不鲜。但为何有那么多人依然铤而走险,前仆后继地跳上传销这条贼船?究竟是有关部门打击不力,还是骗子的骗术太过高明?

应该说,造成此类现象确有多方原因,诸如市场监管的“九龙治水”,以及某

些地方部门的偏袒或贪官的暗中保护伞等。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往往被忽视,那就是滋生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土壤。

全民创富时代,许多人内心里都有个财富梦想,这种梦想若符合合法途径实现,本无可厚非。但有些人为了追逐财富而扭曲了价值观,失去了做人底线。总想着一夜暴富,捞偏门,于灰色地带牟暴利。为此,什么诚信、规则、商业伦理,都不管不顾。于是,假包装、玩概念、消费陷阱等纷纷出笼,什么钱都敢赚,什么歪门邪道都敢撞。而有些侥幸得逞的又成为后来者的“偶像”。

然而,画皮终究要被剥去。骗子的“套路”再深也不可能永久。权健及其追随者并非小倒沟里翻船,而是规律使然。权健大厦的倒下该让那些环顾一夜暴富梦的人警醒!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街谈巷议 大街上的“共享吸烟室”,消解全社会控烟的共同努力

近日,不少路过北京王府井步行街的市民都见到了一个类似露天咖啡座的开放吸烟区,面积足有70余平方米。北京市控烟协会组织专家对此进行实地调查,回应称,该吸烟区明显违背《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并涉嫌误导青少年,应该取缔。记者发现,此吸烟区是一公司为宣传“共享吸烟室”理念而设立。(1月7日《新京报》)

闹市大街,70余平方米的高档吸烟区,这与其说是实用化的室外吸烟室,不若理解为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空间装置艺术。设计精致的不锈钢柱式烟灰缸,如咖啡

吧台一般的高级座椅,烟客们在其间无比惬意地吞云吐雾,此情此景简直就是现场直播的“烟草广告”,其给未成年人所带来的消极示范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以改善吸烟体验、鼓吹吸烟者权利为卖点的商业模式,天然就与全社会控烟的主流价值背道而驰。

的确,为了控制室内二手烟,各地都是鼓励单位建立室外吸烟区的。可即便如此,北京王府井这一设在人口密集区和行人必经通道的“开放吸烟区”,还是太夸张、太离谱、太恶心了。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造成了二手烟的不可控扩散,所有途经的路人,

都可能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受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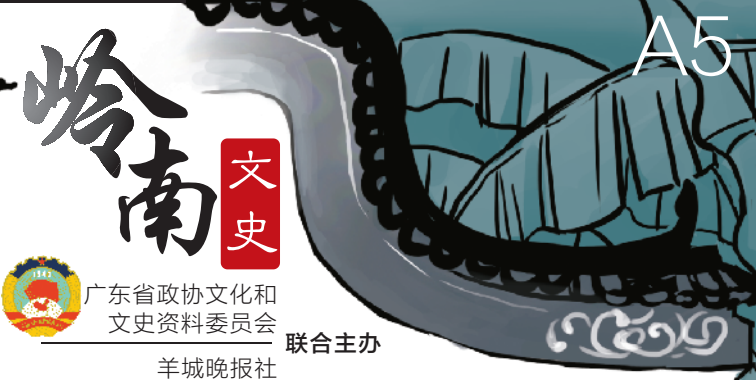
需要重申的一个基本逻辑是,吸烟区的存在,绝对不是为了提高吸烟者的舒适度,而是为了避免其“祸及无辜”。而此类“共享吸烟室”却在标榜“大厦里坐进‘吧台’”“吸烟体验上了一个档次”!在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推广“全城控烟”的大背景下,王府井步行街还在上演大型露天“吸烟秀”,这简直就是不可容忍的倒退。

任何商业项目,都应予以不挑畔公序良俗作为底线,任何试图给予吸烟区超高配置的尝试,本身就是可疑和危险的。每一次对吸烟体验的改善,都是在间接

助长烟草消费。特别是在烟草广告被禁止的情况下,针对此类大庭广众之下暗示意味极强的豪华“吸烟区”,更应该警惕。彻底实现烟草与主流社会的切割,限制二手烟扩散只是第一步,更核心的,还是在于实现“吸烟行为”的隐匿化。

就如同吸烟镜头不应出现在电影、电视剧中一样,吸烟行同样应该被隔绝在日常的公共场景之外,这是对未成年人和非吸烟者的保护。而就算做不到这一点,最起码也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声色香香的“抽烟赛神仙”戏码。

然玉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联合主办 羊城晚报社

访谈

李庆新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

海洋贸易优势让广东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图书产销网络 书籍输出到海外产生特殊长久效应

羊城晚报:随着近些年海外汉籍的挖掘,学界越来越多地发现,中华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其中,从广东港口输出的书籍应当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李庆新:近年来,在传统“西学东渐”研究视角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文明交流中的“中学西传”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包括外销瓷、外销画、外销工艺品、外销书籍等在海外销售传播,并透过这些研究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对西方影响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重新勾勒中外文化交流史。

具体到汉籍的交流,广东书坊刻书业在明代已具备相当规模和水平,降及清代,广东的雕版业刻书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仅有汉籍的印刷,还有外籍的印刷,商品经济的刺激与商品化生产使这里建立起了颇具规模的图书生产、销售网络。而且由于广东面向海洋贸易的独特优势,这里的图书产销具备了国内其他地方没有的特点,与海外市场建立密切的联系,有一部分就是为海外印刷、向海外销售的,这些中国书籍通过贸易途径远销到世界各地。

羊城晚报:可不可以说,海上贸易带动了“海上书籍之路”的兴起?

李庆新:“海上书籍之路”应该说是特殊营商环境下特殊交易的结果。从贸易的角度看,书籍只是海上交往的附带产品,与珍贵奢侈品和日用品比较,书籍无论在数量、销量乃至价格上都不占优势,来华贸易的商人也从来没有为做图书生意专门搞一条船。但书籍又是特殊商品,其政治、文化价值决定它在海外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有阅读、消费的需求,有需求就有市场。中国古代官方在很长时间里都把图书销售作为禁区,但海外市场的需求、印刷技术的发展、对外交往的密切,带动了图书代刻外销的经营活动,也让中外书籍交易成为可能。“海上书籍之路”是海洋商贸交流的市场机制和市场网络起作用的结果,民间海洋社会、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蕴藏着推动诸如书籍的国际流动与跨文化交流的深层次的内部力量,华商网络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羊城晚报:那应该如何评价“海上书籍之路”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呢?

李庆新:“海上书籍之路”是古代东西方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的特殊形式和载体。这种交流是长期的,源源不断的书籍输出到海外,最终会产生特殊的、长久的效应。书籍不同于一般商品,其价值不仅仅在当下,还可以长久保存,流传后世,教化育人,对一些主要交流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因此,传统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近世西方“中国热”的出现,书籍交流功不可没。在新历史背景下,书籍交流本身就是中外交流、文化交往的重要载体,为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提供互鉴共享的人类智慧与文明成果,更好地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发挥独有的作用。